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二十編

林慶彰主編

第7冊

宋代《詩經》學與理學(上)

陳戰峰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宋代《詩經》學與理學（上）／陳戰峰 著 -- 初版 -- 新北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民 104〕

目 6+172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二十編；第 7 冊）

ISBN 978-986-322-996-4（精裝）

1. 詩經 2. 研究考訂 3. 宋代

030.8

103026836

ISBN-978-986-322-996-4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二十編 第七冊

ISBN：978-986-322-996-4

宋代《詩經》學與理學（上）

作 者 陳戰峰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5 年 3 月

定 價 二十編 21 冊（精裝）台幣 3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宋代《詩經》學與理學（上）

陳戰峰 著

作者簡介

陳戰峰，男，1973年生，陝西藍田人。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歷史學博士，2008至2011年曾在西北大學中國漢語言文學博士後流動站從事博士後研究。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儒學思想史。

已出版學術專著2部，編著1部。參與修訂出版本科生教材、研究生教材等3部。發表論文20餘篇。

獲省部級、廳局科研獎勵3項，分別是陝西省優秀博士論文獎（2007），2009年陝西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2009年陝西省第九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評獎三等獎等。參與完成的教材多次獲陝西省優秀教材一等獎、陝西省優秀教學成果特等獎等。

獨立主持國家、省部、廳局級社科項目7項。

此外，2006年起利用業餘時間兼任《華夏文化》（季刊）常務責任編輯，負責編輯、修改稿件等工作，已出版30餘期。合作主編出版文集1部，副主編文集1部。協助增訂整理學術著作、文集、教材共10餘部。

提 要

《詩經》是中國古代最早的一部詩歌選集，也是中國古代的重要文化典籍之一。關於《詩經》的研究，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圍繞《詩經》文本的研究和闡釋，形成了比較有特色的《詩經》學，包含著廣泛的研究領域，其中就有史學領域。對《詩經》文本不同屬性的確認，與相應的研究方式和特點相互作用。將《詩經》及《詩經》學視為思想學術史的史料，正是對其史學功能和性質肯定的結果。「五四」以後以及現代《詩經》及《詩經》學研究，有不少有益的嘗試和啟發。但是，在將《詩經》文本定為文學文本、《詩經》的文學研究佔據核心地位的情況下，這個領域的系統深入研究未引起充分的重視。

本文選擇《詩經》學史上打破定於一尊的宋代《詩經》學作斷代的研究，努力揭示《詩經》學學術現象和理學的內在關係，因此，命名為《宋代〈詩經〉學與理學——關於〈詩經〉學的思想學術史考察》。在對理學家和其他學者紛繁的《詩經》學學術成果考察和歸納的基礎上，嘗試將其中的理學及思想因素剝離和凸現出來。通過對《詩經》學的思想學術史考察，一方面，有助於從思想學術史角度觀照和解釋一些單純在文學領域考察而難以理解的問題；一方面，進一步豐富和擴展思想史和學術史的研究領域和史料範圍，宋代《詩經》學也是思想史的研究對象和思想的承載方式。

本文主要包括導論、論文主體、結論等三部分。

導論解決《詩經》學思想學術史研究的可能、歷史和現狀、方法問題。論文主體共九章，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一至四章，第二部分包括五至九章。這兩部分都呈縱橫交叉方式，它們各自內部和相互之間體現出思想史和學術史相結合的特徵，但各有側重點。第一部分從橫向上探討宋代《詩經》學思想學術史研究的學術淵源、價值觀以及經典解釋的方法和理學之間

的關係，涉及四大問題，包括：宋代《詩經》學的相關概念、研究資料與階段劃分；宋代《詩經》學流變的思想學術原因考略，即與漢唐《詩經》學、三家《詩》及《四書》學的關係；宋代《詩經》學學者基本的《詩經》觀，宋代學者對《詩經》載道功能的認識和弘揚、對《詩序》的複雜態度以及對「淫詩」的看法，構成了宋代《詩經》學學者基本的《詩經》觀，並與理學有著內在的關聯；宋代解《詩》的兩種方法史論與理學，即「據文求義」與「古今人情一也」，基本可以貫穿宋代嶄新的《詩經》學研究。在每個問題內部又竭力勾勒其歷史演變，學術觀點的繼承和延展，突出學術性，但也包含著思想性，可以為第二部分作好鋪墊，互為映襯，並有助於第二部分在探討思想問題時相對集中。第二部分則從縱向上探究宋代《詩經》學內涵的思想因素，按照時間劃分，呈個案研究的序列結構。主要依據是《詩經》學資料，所以也會糾葛部分學術問題，是對第一部分的具體化和拓深，但基本集中，涉及了一些明顯的理學學術問題的討論和思辨。試圖以「義理解《詩》」的增強和演變為主線，以關鍵人物（歐陽、蘇、王、張、二程、謝、楊、朱、陸、呂、王（柏）等）和學派為著眼點，門生後學及其他附及，包括程大昌、王質、葉適、陳亮、戴溪、謝枋得等。這是論文的主體結構和圖景。結論以作收束。

關於宋代《詩經》學的發展階段，本文未拘泥尊《序》與廢《序》的二元對立分析，在階段劃分上，也未採取三階段說，而是按照宋代《詩經》學學術的實際，結合歷史和理學的發展，釐為五個階段，試作勾勒和梳理。

宋學與理學的奠基者「宋初三先生」與歐陽修，前者未有專門的《詩經》學著作，只作適當鉤沉；歐陽修《詩本義》對宋代《詩經》學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並觸及一些理學問題。蘇軾繼承唐代成伯嶼的《詩經》學主張，對宋代《詩經》學發展影響深遠。歐陽修、蘇軾在方法與觀點上皆有開創之功，其中還包括柳開、劉敞等，這是宋代《詩經》學與理學相互影響的準備階段。宋代有些學者將當時經學的實質性變化追溯至周濂溪，而據流傳典籍周敦頤並沒有集中的《詩經》學作品。宋代「義理化」的《詩經》學開端於王安石，但還含有漢學的因素，體現了漢宋學術的轉折特徵，但已主張側重義理的說解，標誌是以樸素的二分的辯證思想研究《詩經》，論證天人、陰陽、常變、德仁等義理。這種風氣也影響到其門客蔡卞的《詩經》學名物研究。王安石將「道」分裂為「天道」與「人道」的觀點與思維方式遭到二程、張載的批評。張載與二程的《詩經》研究在思想上更加突出心性的重要，《四書》得到標榜，《四書》之學逐漸形成，並在思想上向《詩經》研究滲透。這是宋代《詩經》學「以義理解《詩》」方法的逐步確立階段。程門謝良佐、楊時的《詩經》研究體現了兩宋之際《詩經》學與理學緊密結合的延續。鄭樵斥《序》，啓迪朱熹後期《詩經》學廢《序》解《詩》，同時《四書》已形成，不僅影響至《詩經》學，而且成為解釋儒家經典的理論根據，所謂「義理之淵藪」。作為理學和《詩經》學的集大成者，朱熹《詩經》學已出現融合諸家的傾向。陸學與朱學在對「心」的論定上有差別，本體論、治學方法與風格迥異，理本論和心本論也反映在朱陸的《詩經》學中，《詩經》的心學研究以陸九淵、楊簡、袁燮為代表。試圖調整朱陸之學的呂祖謙也以融合諸家為特徵，其《詩經》學在當時也佔有顯著的地位。這是宋代《詩經》學逐步調整和集大成的階段。朱熹三傳弟子王柏主張刪《詩》，同時《詩經》學研究日漸空疏，王應麟在《詩經》義理研究的同時，逐漸涉及《詩經》的輯佚、歷史地理研究，《詩經》學出現了多樣化的發展階段，也意味著《詩經》理學研究日益呈現出衰落氣象。「以詩言詩」的說法至南宋末較普遍了，或稱為「即詩論詩」，不難發現與歐陽修「據文求義」的承革關係，但是更加重視對《詩經》文本的依賴，甚至有的學者對諸家解說的紛紜已無調和興趣，「反古」的傾向進一步增強，不僅是擺落漢唐，甚至連兩宋的《詩經》學也不理會了，出現了一些《毛詩玄談》之類的作品和「不說者為上」的言論。《詩經》學的空疏衰落及某一家的獨

尊可能已不可避免。元明清《詩集傳》獨尊，除王夫之等外，《詩經》學義理研究創新不夠，明清「獨立思考派」的義理研究逐漸轉向文學的體味和鑒賞。

本文除對宋代《詩經》學學者的《詩經》學研究方式、學術觀點等和理學之間的關係有些許考察外，還涉及不少與思想相關的學術問題的爭辯和討論。集中體現在九幅表的統計分析（其中一幅為借鑒他人研究成果）中，涉及宋代《詩經》學的特點與位置、《詩本義》解《詩》的兩種方法、歐陽修對待《詩序》毛《傳》鄭《箋》學術態度比較、《詩解》是否為「雜說」、《詩經集傳》與《詩序》的關係、《詩疑》刪詩目錄所缺詩篇的名稱和學術原因等問題。

通過對宋代《詩經》學的思想學術史考察，關於宋代《詩經》學與理學的關係認識就不僅僅是「理學化」所能概括的。從歐陽修等開始，在學者眼中，《詩經》就不只是文學的、章句的文獻，而是傳達「道」和承載「道」的方式，宋代《詩經》學學者的疑鄭、疑毛、疑《序》，進而廢《序》、疑經、改經，乃至否定《詩》為徒歌、主張「淫詩」說等皆與這種「道」的觀念相關。甚至可以認為，宋代《詩經》學的新氣象以及在今天依然閃耀著光輝的學術觀點也是在這種觀念和背景下催生的，儘管這些學者並非人人將《詩經》所有詩篇都打上「道」的烙印，他們通過涵泳而獲致心性之理、人倫之理以及對天人關係進行把握的義理解《詩》途徑，使宋代《詩經》學特色獨具，別樹一幟。宋代的疑古思潮和解經新風在現代以及當代《詩經》學研究中也得到一定的呼應和推進。

本文涉及的思想學術問題較多，兩宋之際的《詩經》學研究因資料缺乏而比較薄弱，一些問題還有待進一步深入挖掘和研究，而主要突出宋代《詩經》學思想學術史的合歷史與合邏輯的考察重點。



目

次

上 冊

導 論	1
一、《詩經》和《詩經》學	1
(一)《詩經》簡說	1
(二)《詩經》學提要	4
二、《詩經》的性質確認與《詩經》學研究	10
三、《詩經》和《詩經》學的歷史學和思想史 研究	13
(一) 古代兩個解《詩》傳統的開出	13
(二) 現代對《詩經》及《詩經》學的 思想學術史研究	16
四、宋代《詩經》學的研究現狀、存在問題及 研究目標	26
五、宋代《詩經》學思想學術史研究的方法及 價值	32
第一章 宋代《詩經》學的相關概念、研究資料與 階段劃分	37
第一節 宋學·理學·義理之學·宋代《詩經》學	37
一、「宋學」與「理學」的內涵	37

二、漢宋學術與義理之學	40
三、理學與宋代《詩經》學	46
第二節 宋代《詩經》學研究資料、階段劃分及其依據	51
一、宋代《詩經》學研究資料	51
二、宋代《詩經》學的階段劃分及依據	55
第二章 宋代《詩經》學流變的思想學術原因考略	65
第一節 宋代學者對漢唐《詩經》學的態度和評價	67
一、宋代學者對漢唐《詩經》學的基本看法	67
二、歐陽修對漢唐《詩經》學的反思	72
第二節 宋代《詩經》學與三家《詩》的關係	74
一、宋代重視三家《詩》的學者及觀點	76
二、三家《詩》的心性義理解《詩》萌芽	82
第三節 宋代《詩經》學與《四書》學的關係	86
第三章 宋代學者的《詩經》觀與理學	95
第一節 宋代學者對《詩經》本質和功能的認識	95
第二節 宋代學者對《詩序》的認識	105
第三節 宋代學者對「淫詩」的認識和評價	116
一、「淫詩說」的起源	116
二、宋代學者對「淫詩」的看法述要	119
三、針對「淫詩說」的兩種處理方式和學術態度	123
第四章 「據文求義」與「古今人情一也」——宋代解《詩》的兩種方法史論與理學	129
第一節 「據文求義」和「古今人情一也」方法的成熟	130
一、兩種方法的內涵及關係	130
二、歐陽修對兩種方法的運用及意義	134
第二節 「據文求義」和「古今人情一也」方法的影響	138
一、宋代《詩經》學學者對「據文求義」的繼承述略	139

二、宋代《詩經》學學者對「古今人情一也」的繼承述略	147
第五章 宋代《詩經》學的義理萌芽——歐陽修及三蘇的《詩經》學研究	155
第一節 歐陽修的《詩經》學思想研究	155
一、《詩本義》及其體例	155
二、歐陽修《詩經》學的本末觀與解讀目標	157
三、歐陽修觸及一些有理學或近似理學性質的《詩經》學問題	161
第二節 蘇轍及其父兄的《詩經》學與思想學術	164
一、疑《序》與義理解說	165
二、蘇轍的性命義理簡說	166
三、蘇洵及蘇軾的《詩經》學思想	169

下 冊

第六章 以心性義理解《詩》方法的逐步確立和理學	173
第一節 王安石的《詩經》學與其學術思想——漢宋《詩經》學的過渡和樞紐	173
一、王安石《詩經新義》及其漢宋學術過渡特徵	174
二、王安石《詩經》學的學術思想	181
三、蔡卞《毛詩名物解》——荊公《詩經》學的名物學注腳	191
第二節 張載的《詩經》學鉤沉與研究	196
一、張載《詩經》學文獻和心性義理取向	196
二、文質相得、體用不離	202
三、萬事只一天理	206
第三節 程顥、程頤的《詩經》學研究	211
一、二程的《詩經》學文獻和「義理」解《詩》取向	212
二、《詩解》新解：《詩解》不是「雜論」	215
三、以理學解《詩》，闡發修齊、治學之理	221
四、以理學解《詩》，闡發情性之理	224

第七章 兩宋之際《詩經》學管窺	231
一、兩宋之際的王學	231
二、楊時排擊王學略述	234
三、兩宋之際的《詩經》學	236
第八章 宋代《詩經》學義理解釋的進一步調整和成熟	245
第一節 朱熹的《詩經》學與理學	247
一、從義理角度反思「刪改未盡者」—— 《詩集傳》的改稿與初稿	247
二、朱熹解《詩》的理學基礎探析	251
三、修身之法——誠和敬	259
四、命理道欲之辨	261
第二節 陸九淵及其弟子的《詩經》學研究	265
一、陸九淵的《詩經》學見解鉤輯與心學	266
(一)《詩》以明道，道事不離	266
(二)此理誠明，踐履不替	270
二、楊簡的《詩經》學研究	277
(一)楊簡的《詩經》學著作及學術特徵	277
(二)楊簡《詩經》學中的心學思想	281
三、袁燮的《詩經》學研究	292
(一)格君心	292
(二)論情性	298
(三)說義理	303
第三節 呂祖謙的《詩經》學研究	307
一、《呂氏家塾讀詩記》與呂祖謙《詩經》學 學術傾向	307
二、「識見得正心」與「準則在人心」	311
三、中和爲則，復歸本心	314
第九章 宋代《詩經》學理學解釋的衰落和影響	321
第一節 王柏的《詩經》學和理學	322
一、王柏學術淵源與擬刪《詩》	322
(一)朱學衣鉢與擬刪《詩》	322

(二) 王柏擬刪而重改的一首詩篇目考	325
二、王柏《詩經》學的理學思想與文學傾向	329
第二節 戴溪的《詩經》學與理學	332
一、天命與天理	334
二、對「情」的雙重理解	337
第三節 宋代《詩經》學義理解《詩》的餘波和影響	343
一、宋代《詩經》學義理解《詩》的餘波	343
(一) 段昌武的《詩經》研究	343
(二) 謝枋得的《詩經》研究	346
二、王應麟的《詩經》學轉向	353
三、宋代《詩經》學義理解《詩》的影響	356
結 論	361
參考文獻	371
附錄：宋代《詩經》學部分學者簡介	385
後 記	387
圖表目次	
表 1：宋代與其它各代《詩經》研究著作比較簡表	53
表 2：宋代「五經」及《四書》研究著作比較簡表	54
表 3：《詩本義》「據文求義」不同表述比較簡表	131
表 4：《詩本義》評價《詩經》研究的情理標準比較簡表	131
表 5：歐陽修對待《詩序》、毛《傳》、鄭《箋》的學術態度比較簡表	159
表 6：程頤《詩解》所錄《國風》詩篇統計簡表	218
表 7：程頤《詩解》所錄大、小《雅》詩篇統計簡表	219
表 8：朱熹《詩經集傳》與《小序》解題比較簡表	251
表 9：王柏擬刪詩篇與《詩序》評價對照簡表	328

導 論

一、《詩經》和《詩經》學

《詩經》是中國古代最早的一部詩歌選集，也是中國古代的重要文化典籍之一。

（一）《詩經》簡說

關於《詩經》的性質，主要有兩種基本的劃分，一認為是上古民歌或詩歌的總集，如鄭振鐸、陸侃如、馮沅君等。鄭振鐸認為「《詩經》大約是公元前第三四世紀至公元前第六世紀的中國北部的民間詩歌的總集」〔註1〕，而顧頡剛在《古史辨》第三冊下編中認為不盡是民歌，為是；時間斷限上也值得商榷。陸侃如、馮沅君則明確地表達為「民間男女所歌，公卿列士所獻，而經魯國師工譜為樂章的總集《詩經》」〔註2〕。一認為是上古民歌或詩歌的選集（以這種意見為勝），夏傳才認為《詩經》是「最古的一部詩歌選集」〔註3〕。

《詩經》的產生時代至今依然有爭議，下限主要在春秋中葉，爭議在陳靈公或秦襄公時；主要則在上限，集中在《商頌》的認定上，歷史上有「商詩說」與「宋詩說」，時代早晚大相逕庭，前者如《毛詩序》、姚際恒《詩經通論》（卷十八）、馬瑞辰《詩經傳箋通釋》（卷三十二）、胡承珙《毛詩後箋》

〔註1〕鄭振鐸編：《文學大綱》（彩圖本）（上冊），商務印書館，1927年，第262頁。

〔註2〕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山東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9頁。按：《中國詩史》為中國詩歌史專門研究的開山之作，曾在三十年代產生過重大反響，魯迅先生曾將其與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王國維《宋元戲曲史》、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等一併向人推薦。

〔註3〕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中州書畫社，1982年，第3頁。

（卷三十，陳奐補），後者的依據多為《國語·魯語》、《史記·宋世家》、《後漢書·曹褒傳》注引薛君《韓詩章句》、魏源《詩古微》（卷六）、王國維《說商頌》（《觀堂集林》卷二）等。今多從王國維證成的「宋詩說」，但鄭振鐸認為「《商頌》中的五篇，為商代（公元前一千七百年以後，公元前一千二百年以前）的產物」（註4），陳子展與鄭振鐸的看法相同，認為屬於商詩，今天贊同者亦不乏其人。

傳統社會將《詩經》按表現手法和風格的不同分為《風》、《雅》、《頌》（註5）三類，現當代則以題材內容與藝術形式的差異劃分得更細緻。鄭振鐸將《詩經》詩篇主要分了三大類：第一類是「詩人的創作」，如《正月》、《十月》、《節南山》、《嵩高》、《蒸》（註6）民》等；第二類是「民間歌謠」，包括戀歌（如《靜女》、《中谷》、《將仲子》等）、結婚歌（如《關雎》、《桃夭》、《鵲巢》等）、悼歌及頌賀歌（如《蓼莪》、《麟之趾》、《螽斯》等）、農歌（如《七月》、《甫田》、《大田》、《行葦》、《既醉》等）及其他；第三類是「貴族樂歌」，包括宗廟樂歌（如《下武》、《文王》等）、頌神樂歌或禱歌（如《思文》、《雲漢》、《訪落》等）、宴會歌（如《庭燎》、《鹿鳴》、《伐木》等）、田獵歌（如《車攻》、《吉日》等）、戰事歌（如《常武》等）以及其他（註7）。費振剛先生主持的《詩經詩傳》（註8）的分類與此較接近，只是多出男歌、女歌及政治詩等欄目，一些欄目作了調整，可視作對前者的繼承和發展。

《詩經》詩歌來源比較複雜，歷來有采詩、獻詩、作詩、頌詩等說。認為《詩經》詩歌屬公卿大夫獻詩或陳詩的，多根據《國語·周語》「邵公諫厲王」語、《國語·晉語六》「范文子」語；認為屬聽詩以觀民風的采詩說，多據《禮記·王制》、《漢書·食貨志》和何休《春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解詁》等說法；認為二者兼有，多據《左傳·襄公十四年》載師曠語等。合樂則據《詩經·周頌·有瞽》、《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等。今也多認為詩歌以多種方式彙集而成，並經過有意識地編輯，「今本《詩經》傳自魯國是

〔註4〕鄭振鐸編：《文學大綱》（彩圖本）（上冊），商務印書館，1927年。

〔註5〕有人將《二南》獨立出來為《南》。也有不同意見，「其實『二南』中的詩與邶、衛、鄭、陳諸風中的詩其性質極近，並無所謂『教化』與『譏刺』的區別在裏面的」（鄭振鐸編：《文學大綱》，第272頁）。

〔註6〕一般作「烝」，鄭先生寫作此，當據三家《詩》。

〔註7〕鄭振鐸編：《文學大綱》（彩圖本）（上冊），商務印書館，1927年，第276頁。

〔註8〕費振剛、趙長征、廉萍、檀作文：《詩經詩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很可能的」〔註9〕，依據是《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觀樂」及昭公二年「周禮盡在魯矣」的史料，顧頡剛先生認為《詩經》三百篇均入樂，即使民間歌謠，也已被改為樂章了〔註10〕，徐仲舒先生在《幽風說》中證明「《詩經》為魯國工歌之底本」〔註11〕，都似乎在說明《詩經》的整理與魯國的樂師等學者有不可分割的聯繫。

《詩經》的影響很深遠，除過文學影響即現實主義風格與傳統外，在二千餘年的古代傳統社會〔註12〕，由《詩》而演變為《詩經》，現當代又剝離掉經學面目而恢復其文學屬性，《詩經》的性質、功能與研究方法皆發生了重大的本質變化。《詩經》的名稱見於《莊子·天運篇》與《禮記·經解上》，一般以後者為最早，其經學地位由西漢綿延至清末，並伴有多次的「宗經辨騷」活動，將《詩經》與《楚辭》對立起來，因此就古代傳統社會而言，《詩經》主要體現出濃鬱的思想文化價值，與儒家文化的歷史緊密相伴。鄭振鐸先生有段很有分寸的概括：

就文學史上看來，《詩經》的影響亦極大，漢至六朝的作家，除了《楚辭》以外，所受到的影響最深的就算是《詩經》了。自韋孟的《諷諫》詩，《在鄆》詩，東方朔的《誠子》詩，韋玄成的《自劾》詩，《誠子孫》詩，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傅毅的《迪志》，仲長統的《述志》詩，曹植的《元會》、《應治》、《責躬》，乃至陶潛的《停雲》、《時運》、《榮木》，無不顯著的受有《詩經》裏的詩篇的風格的感化。不過，自此以後，《詩經》成了聖經，其地位益高，文人學士，都不敢以文學作品看待它，於是《詩經》的文學上的真價與光煥，乃被傳統的崇敬的觀念所掩埋，而它的在文學上的影響便也漸漸的微弱了。〔註13〕

至於《詩》成為儒家經典之後，其對文學的影響作用是否減弱還值得進一步研究，今多數學者與《中國文學史》並不如是看，尤其是《詩經》中的現實主義傳統與賦比興的手法，對後世文學的影響深遠深刻，已不辨自明；但鄭

〔註9〕 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山東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9頁。

〔註10〕 顧頡剛《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載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三冊），樸社，1931年，第608～657頁。

〔註11〕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四分冊。

〔註12〕 「封建社會」概念易帶來歧義和爭執。

〔註13〕 鄭振鐸編：《文學大綱》（彩圖本）（上冊），商務印書館，1927年，第267頁。

先生的看法可以代表當時學者的認識，對《詩》性質變化的揭示也很準確。

（二）《詩經》學提要

1. 《詩經》學幾個相關名稱及內涵辨析

範疇辨析包括「詩學」、「《詩》學」、「詩經學」、「《詩經》學」四個相互關聯的概念，其中後三個術語皆有學者使用，也可以通用。

「詩學」概念，有廣、狹義之分。廣義的「詩學」指文藝理論，涉及到文藝創作的心理、過程及作品的形式、接受和意義等的研究，如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和賀拉斯的《詩論》等。狹義的「詩學」，在經學意義上可以指專治《詩經》的學問，但一般多指對包括詩、詞、曲等韻文文體的研究〔註14〕，如謝无量《詩學指南》，該書系文言體，探討古代詩歌淵源流變（分為通論、古詩、律詩三部分），尤其重視詩體與詩法（包括格式、聲韻）的研究，吳興皞皞子《序》稱謝氏云「示人以形式而使人自得於形式之外」〔註15〕。其他如李元洛《詩學漫筆》〔註16〕、戈仁《詩學札記》〔註17〕等，佛雛《王國維詩學研究》〔註18〕則涉及不少思想文化和學術問題，範圍要廣一些。

其實，狹義並不一定就和明確掛鉤。「對於詩學的狹義理解，或是在經學意義上的『詩學』，即專治《詩經》之學，或是在『詩、詞、曲』這個詩歌大家族中『詩』的專門含義，也非我們所認同。在我看來，『詩學』的研究範圍，應該是包括著詩、詞、曲等韻文文體。詩、詞、曲雖然在體制上頗有不同，但都同屬詩歌這個大的文學種類」〔註19〕，按照這個標準，先秦的

〔註14〕按：《中國詩學》專刊，已出了第一、二輯，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出版。即多在後一種意義上使用這個概念。謝思煒的《唐宋詩學論集》（收入新清華文叢）選錄了一系列「詩學」方面的論文，宋代部分就有《宋祁與宋代文學發展》、《呂本中與〈江西宗派圖〉》、《呂本中詩歌創作簡論》、《南北宋之際的政治學術分野與詩學分派》、《夢窗情詞考索——簡論本事考索及情詞發展歷史》、《傳奇的衰落與詞的興起》，與宋代有關的如《禪宗的審美意義及其歷史內涵》、《樂之歧解——從蘇軾到袁宏道》等（謝思煒：《唐宋詩學論集》，商務印書館，2003年），可見，其詩學概念主要也是指詩歌（包括狹義的詩和詞）的創作和接受理論及其影響因素。

〔註15〕吳興皞皞子：《序》，載謝无量：《詩學指南》，中華書局，1918年，第1頁。

〔註16〕李元洛：《詩學漫筆》，花城出版社，1983年。

〔註17〕戈仁：《詩學札記》，金陵書社出版公司，1996年。

〔註18〕佛雛：《王國維詩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

〔註19〕張晶：《向中國詩學的深處拓進（代序）》，載張晶、白振奎、劉潔：《中國古典詩學新論》，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2年，第1頁。

騷體賦、西漢大賦、東漢抒情小賦、六朝駢體文等講究用韻的文體不知是否在內。如在內，韻文的範圍至少會擴大至散文；如不在內，韻文的範圍則會縮小至詩歌〔註20〕。因此，作為狹義的「詩學」概念和內涵依然是不十分明確的，內容往往遊移不定。但這種理論形態的「詩學」和研究者的界定緊密相關〔註21〕，所以也可以訴諸於研究者的個性化的界定，但情形就更加複雜微妙。如蕭華榮《中國詩學思想史》中的「詩學」概念指「現代通常所說的狹義的『詩學』，即有關詩歌這一特定文體的理論」〔註22〕，將詩、詞、戲曲、小說並立，詩歌概念是狹義的、具體的，因為在中國文學史上，詩歌與散文兩種文體貫穿始終〔註23〕，所以蕭氏又認為「從這種意義上說，所謂中國詩學思想史，也可以說是以詩學思想為主線的中國文學思想史」〔註24〕，因而又有一定的廣義性質。他認為「詩學」包括兩個層面，即「『形上』層面」，「包括對於詩的性質、功用等的認識與觀念」；「『形下』層面」，「包括關於詩的具體做法、格律、聲調、對偶等等」，而他則側重於理論性強的前者。自然，蕭氏的「詩學」概念就兼有「狹義」和「廣義」兩種因素。

當然，不少學者已經注意到思想學術（包括宋代理學）和這種意義上的「詩學」之間的關係，如蕭華榮、謝思煒等。蕭華榮先生認為「詩學思想往往最關世道人心、政教風化，與一般文化思潮和學術思潮息息相通」，因此「側重於在學術、文化思想流變的背景上考察詩學思想的流變」〔註25〕。他主張一般文化（指儒、道、禪等社會文化思想）、學術思想對詩學思想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直接的影響帶有強制的色彩，要求以詩的形式徑直闡發宣揚某種思想原則和人生哲學。在儒家的經學期，這種影響表現為牽附政教風化的『諷喻詩』及相關的理論主張；在儒家的理學期，表現為明心見性的

〔註20〕 曲則主要指散曲中的單支曲，而將套數除外，因其形式與韻味更接近詞，尤其是出自文人手中的作品，而雜劇就更不在其內了，而轉入戲曲或戲劇。

〔註21〕 「『詩學』之為『學』，並非是古人自己就已有的，是我們今天以『詩學』的意識和理論去觀照的結果」（張晶：《向中國詩學的深處拓進（代序）》，載張晶、白振奎、劉潔：《中國古典詩學新論》，第2頁）。

〔註22〕 蕭華榮：《導言：中國詩學思想的邏輯發展》，載蕭華榮：《中國詩學思想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頁。

〔註23〕 錢基博先生《中國文學史》主要以此兩項構成線索和主體。

〔註24〕 蕭華榮：《導言：中國詩學思想的邏輯發展》，載蕭華榮：《中國詩學思想史》，第1～2頁。

〔註25〕 蕭華榮：《導言：中國詩學思想的邏輯發展》，載蕭華榮：《中國詩學思想史》，第2頁。